

国际化再获突破 人民币全球弱势地位犹在

■ 本报记者 王莹

国际清算银行(BIS)近日发布报告指出,全球外汇交易额在过去3年时间大幅增长,人民币跻身全球十大外汇交易货币之列。调查显示,过去3年人民币日均交易额由340亿美元增至1200亿美元,占全球外汇交易额的2.2%,在全球外汇货币排名中,人民币已由2010年第17位升至第9位。

分析人士认为,跻身全球第九大货币,说明人民币国际化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但同时不容忽视的是,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仍处弱势地位。

数据显示,中国GDP已占全球GDP总量的11.75%,中国对外贸易总额在全球贸易总量中的占比提升至11.1%,但人民币在货币交易量中的占比仅为1.1%。

人民币仍处全球货币体系中弱势地位

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经济总量达8.25万亿美元,首次超越美国成为世界贸易规模最大的国家,在全球贸易总量中的占比提升至11.1%左右。然而,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仍然弱势。

招商银行总行金融市场部高级分析师刘东亮分析,中国GDP已经占到全球GDP总量的11.75%,仅次于美国的22.4%,居第二位,但美元在货币交易量中的占比高达43.5%,同时,一些经济规模较小的经济体,如瑞士,其GDP仅占全球的0.9%,而其货币交易量却远高于人民币的份额,占到2.6%。这表明人民币弱势地位较为明显。

目前人民币在欧洲和美国使用率跟交易量仍然较低。根据BIS报告及香港金管局报告,离岸人民币交易量香港占有的份额为65%左右,而欧美地区交易量较低。“关键原因在于

2007年6月
首只人民币债券登陆香港

2009年7月
上海、广州、深圳、珠海、东莞5城市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

2010年6月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范围扩大到20个省市,境外地域扩展至全球

2010年10月
新疆启动跨境贸易与投资的人民币结算试点

2011年1月
中国银行纽约分行开展针对美国客户的人民币交易业务

2011年1月
央行公布实施《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启动人民币境外直投试点

2013年9月
人民币跻身全球第九大交易货币



人民币不能在欧美地区进行有效交割。”业内人士指出。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联合交通银行最近发布的《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13》指出,当前影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障碍包括:中国当前贸易大而不强,企业在贸易中使用人民币结算的意愿与能力均不足;中国金融机构的国际化发展滞后于中国贸易发展。

人民币国际化 首选周边国家推进

2007年6月,首只人民币债券登陆香港,此后内地多家银行先后多次在香港推行两年或三年期的人民币债券。

2009年7月,中国央行正式出台《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

为内地企业、银行在我国港澳地区和东盟等境外地域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提供具体指导,标志着人民币迈向贸易结算货币的第一步。

2008年至今,我国已先后与超过20个国家、地区的央行及货币当局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货币互换虽非严格意义上的货币国际化步骤,但却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突破口。

“从空间上来说,由于我国是一个地区性强国,与邻国有着密切的经贸往来,因此人民币国际化首先选择了从周边国家和地区来推进,其次是贸易往来密切的国家。”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称。“而在人民币区域化这一过程中,首先让人民币成为周边国家贸易结算货币,进而通过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的发展,让人民币成为金融交易的计值、结算和流通货币,最终再让人民币成为这些国家的储备货币。”潘向东指出。

人民币如何在海外“留得住”

专家指出,人民币国际化的最根本问题还是在于人民币如何能“走得

出去”,如何能在海外“留得住”,如何能“回得来”这几个方面。

“目前,跨境结算规模不断扩大,近来国家又开始鼓励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这些措施都有助于人民币留在境外。但其他国家接纳人民币也是有条件的,要么需要购买中国的产品、设备、服务,要么需要投资中国。”

接下来,人民币在海外还得“留得住”。“这需要积极培育人民币的离岸金融市场,创新人民币投资产品,使海外人民币有足够丰富的投资渠道,这样才能够逐步形成海外人民币市场,扩大人民币在海外的影响。”潘向东指出。

最后,要人民币真正“运转”起来,还需要有效的回流渠道。

“首先,可以探索地方政府、商业企业在离岸人民币市场发行债券,并允许所募集的人民币资金能够汇回内地;其次,也可推进外商人民币的直接投资,外商投资企业的外行股东能够以人民币跨境直接投资;再次,可以开展内地和香港银行跨境贷款的试点,香港人民币存量不断增加,人民币的利率也相对较低。同时还可以允许符合条件的机构在香港募集人民币资金在境内开展证券投资业务,拓宽境外人民币的投资渠道。”潘向东认为。

外资撤出 中国银行业迎海外反攻时刻

■ 本报记者 李金玲

9月初,美国银行在香港股市售尽20亿股建行H股,彻底结束了其在建行的战略投资者身份;而今年5月,高盛以11亿美元的价格出售持有的工商银行股份。近年来不少外资机构大举减持中资银行股份。截至目前,建行、工行及中行三大国有银行的境外战略投资者均已退出,目前汇丰仍然持有交通银行19%的股份。

虽然“补充自身资本”是一个公开的理由,但如此频繁的抛售,难免引发业界为中资银行前景担忧的情绪,有观点认为,撤资有可能与外资银行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和银行体系风险的担忧有关。

另有业内人士认为,外资机构入股中资银行带来的最大的财富就是留下了创新的基因,外资减持或许正是一个信号或契机,助推中国银行业“反手一搏”,创新发展方式,将以往的单一“请进来”的做

法转变为“走出去”,争取国际市场和话语权。

国际化经营能力 与国际地位不相符

利润丰厚,发展迅速是近年来中国银行业的最形象描述。近期各家银行陆续披露的半年报显示,四大大型银行的季度业绩均好于预期。但反观国际市场,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却明显偏弱。

在经济全球化与金融国际化的大背景下,中国金融机构跟随制造业涉足海外,已成为一个必然趋势。银监会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底,16家中资银行金融机构已在海外设立1050家分支机构,覆盖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和大洋洲的49个国家和地区。

尽管中国大型国有银行的国际化战略正在加速推进,但中国银行业的国际化经营能力与其国际地位并不相适应。目前中国金融类对外投资的进展依然相对缓慢。中国银

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李佩珈表示,2013年,从全球1000家大银行前十名排名看,中国银行业已占据其中的四位。但是与这种国际地位不相适应的是,我国银行业海外业务规模、收入占比都还很小。

未来5-10年是 银行业国际化关键期

近日银监会国际部主任范文仲公开表示,“今后5到10年,将是中国银行业国际化的关键机遇期。”

业内人士表示,一方面,国际收支账户“双盈余”要求商业银行必须加大对外投资步伐,以缓解人民币升值、外汇储备高企和货币政策空间受限的压力。另一方面,随着我国企业“走出去”步伐的加快,居民财富的积累,尤其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提速,也要求商业银行必须加快国际化经营步伐,以满足企业和居民的跨境金融服务需求。

据了解,商业银行的国际业务也已

从最初的出口买方信贷,发展到出口卖方信贷、项目融资、应收账款融资、国际商业贷款、设备出口租赁、国际结算和全球现金管理、进口预付贷款融资、出口订单融资等多个品种。

中投顾问金融行业研究员霍肖桦对记者表示,金融机构“走出去”步伐较慢,一方面与各国对跨国金融投资的严格限制相关,各国的法律、财政、税收、监管的不同都制约着金融机构“走出去”步伐;另一方面,国内金融机构“走出去”也受资本充足率和专业人才的约束。

“各国对金融投资的限制是客观环境,相应不同的法律、财政、税收与监管要求也是‘走出去’过程中必须要克服的。”霍肖桦说,对于国内金融机构而言,关键在于提升自身的盈利能力和对国际化专业人才的储备上。各国日渐严格的监管要求主要体现在资本充足率、风险控制上,这也是国内金融机构的弱项,是必须要提升的方面。

新兴市场警报： 上升还是沉沦？

(上接第二十五版)

“以‘金砖’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亮点。但经历了长期快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也将面对包括环境、资源、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等一系列瓶颈因素。同时,欧美经济的‘去杠杆化’也意味着新兴经济体的出口动力将难以像过去一样强劲。新兴经济体必须实现自身的经济转型和升级,更加注重创新,才能找到可持续发展的新动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表示。

新兴经济体需要重新审视自身

在国际经济开始出现复苏的大背景下,新兴经济体的难以为继不能仅仅在依附性积累这样的国际经济竞争模式中得到解释,也不能仅仅因为资本抽逃和本币暴跌而将其视为国际热钱的阴谋诡计,更不能简单地认为美国在经济增长速度超过预期这样的背景下开始退出货币宽松政策(QE3)是造成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形势不可高企的罪魁祸首。如果这些都不能去解释新兴经济体的“其勃兴由是焉,其衰退亦由是焉”的根本原因,那么,我们或许就需要重新去审视新兴经济体自身,看其体内所蕴含的那些病兆是否真的才是导致其出现困局的真正原因。

首先,主要的新兴经济体在国内经济发展的引导方式上,更多强调的是按照官方的某种意志来强化经济布局,谋求经济发展。某种官方意志所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或许能暂时性地赢得经济发展的速度,但其无法洞穿经济发展的根本奥秘,从人类知识有限性的角度来看,这种依赖某种单一知识的做法最终败坏的是经济发展的自我修正意识和变革、创新能力。

其次,新兴经济体普遍存在追求短平快的发展模式,对于需要长期组合才能形成的优渥的、合理的经济产业结构,并未给予太多的重视。一头独大的经济安排并不能带动经济全局向良性方向发展,久而久之,新兴经济体多被某几个或某几家经济巨头所形成的利益联盟或利益集团绑架,在提供给这些利益联盟或利益集团以充分优惠的时候,不仅无法应对经济发展的全局调整和布局所提出的内生需要,而且会严重败坏经济自我革故鼎新的能力。

第三,大多数新兴经济体的飞速发展建立在并不平等的制度安排基础上。部分群体攫取了大多数人参与经济发展的机会,是否能参与经济发展,建立在有关活动者是否与权力者存在利益勾兑的基础之上。当部分人攫取了经济发展的机会和最终成果的大部分之余,留下的往往是大多数人的相对赤贫状况。

第四,多数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并不是建立在技术连带效应的基础上,而是依赖其本国所存在的“低度人权优势”,这种“低度人权优势”在保障资方的盈利机会的时候,往往也压低了资方通过技术研发来实现产业升级的激励。一旦“低度人权优势”所依赖的国内外环境发生巨变,新兴经济体借助这种“低度人权优势”所建立的竞争优势也就荡然无存了。

第五,由于权力监管失范已经成为大多数新兴经济体的固有弊端,经济发展往往面临着权力者的恣意妄为而带来的高度不确定性。新兴经济体在表面持续繁荣发展的时候,则往往会因为权力者的有意为之而将自己的经济发展带到一个险象环生而不自知的高风险状态中。

自我变革:再度崛起的关键

我们可以在这样的语境中来找寻新兴经济体在新的一轮全球经济、产业、资本大挪移的大背景下竞争力急剧萎缩的制度原因。在当前全球竞争重新风生水起的大背景下,新兴经济体能否有效、持续、长久地融入国际经济竞争的洪流中并取得相应的竞争优势,基本的着力点应是怎样更革内部的经济制度安排。借用李克强总理的话来说,实现新兴经济体再度崛起的根本问题在于推进改革从而释放出新的制度活力。

这实际上意味着新兴经济体在推进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在试图融入国际经济竞争的语境中,首先不能将经济的问题简单地采用经济的手段来解决,而应当从根本的制度安排和制度供应体系入手来解决其自身在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根本问题。在这样的意义上,即便本意是良好的,政府仍然需要尊重市场,尊重经济运行的固有规律,而不是轻易地向市场发号施令,让市场的归市场,公共权力的归公共权力。

其次,国家应当提供充分的法律保障,以为所有的产业提供充分自由竞争的制度空间,建立防止权力和产业的利益输送链条,激发既有的经济产业的自我优化组合模式;再次,建立高效公平公正的市场进入机制,建立公平公正的再分配机制,阻隔权力向市场伸出不必要之手,防止自我经济体的过度依赖发达市场;第四,解决“低度人权优势”的问题,释放产业的生产能力,提升劳动者在产业体系中的重要性和创造性,加速产业升级;第五,建构与经济发展相一致的权力安排机制,将权力关在笼子里,推动产业的健康发展。

新兴经济体能否在全球经济开始复苏的语境中更改自己的负面印象,重新融入世界经济竞争的洪流中,关键点在于夯实内功,否则,挑战就会直接转换为危机,进而导致其面临“万山不许一溪奔”的艰难局面。

【直播 Live】

中非共促民生发展

■ 本报记者 高巧艳

由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简称中促会)主办的“中非共促民生发展研讨会”于9月13日举办。

本次研讨会是为召开第三届中非民间论坛做好准备而召开的一次重要研讨活动。研讨会的主题为“推动民生合作、分享发展经验、促进民间友好”。共有来自非洲20国的70余名民间组织负责人、专家学者、政党青年领袖、媒体代表参会。中方代表包括有关部

委、中促会团体会员单位和个人理事、国内民间机构负责人、专家学者、媒体、企业和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师生代表。中非双方代表围绕“中非发展经验分享”与“中非民间合作新思路”,进行了一天的热烈讨论和充分交流,达成了广泛共识,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和积极成效。

中促会成立于2005年10月,现有63家团体会员和160多个个人理

事,是国内最大的涉外民间组织联合体。中促会成立以来致力于推进中非民间交往,主办了两届中非民间论坛,邀请近200位非洲前政要、非政府组织负责人、智库、媒体代表来华考察研修,多次赴非洲开展免费摘除白内障的“光明行”、艾滋病宣传培训、打水井、捐赠教学用品和药品、农业技术培训等民生项目,得到非洲民间社会的热烈欢迎和积极反响。